

馆藏文物定级

文物是指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可以分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前者如陶瓷、书画、金属器以及玉石器等，后者如石窟寺、古建筑以及古墓葬等。博物馆展陈的一般是可移动文物，这些文物是博物馆发挥功能的核心资源。当前，全国博物馆存在大量未定级文物，它们不仅影响分类分级管理，也难以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因此，对馆藏文物进行定级，有助于藏品的进一步保护、管理、研究与利用。

馆藏瓷器类一级文物定级标准及实例探讨

《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将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与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馆藏一级文物被认为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该标准对一级文物的定级进行了举例，其中，瓷器类一级文物的举例为“瓷器时代确切，在艺术上或工艺上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在纪年或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造型、纹饰、釉色等能反映时代风格和浓郁民族色彩的；有文献记载的名瓷、历代官窑及民窑的代表作”。

“瓷器时代确切，在艺术上或工艺上有特别重要价值的”，指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且地层明确，未经后期扰乱器物；或者器物上本身带有明确的纪年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瓷器上的纪年款，常有后朝伪托前朝的情况，例如康熙瓷器书写“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识，此类器物需要鉴定人员审慎判断。另外，这类瓷器的装饰极具时代特征，制瓷工艺的改进与创新，使之质量与美感得以显著提升。1983年，在南京市雨花台区东吴墓群里出土一件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其釉色青黄，以褐彩绘持节羽人图，并绘有飘逸的云气纹与仙草纹。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为釉下彩为唐代所开创，该壶的发现，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提前了约500年。它被定为一级文物，并入选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现藏于南京市六朝博物馆。

“在纪年或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指的是这类器物性质明确，生产年份或者出土地点清晰，可以成为“标准器”，与其他器物进行比对，帮助鉴定人员做出科学的鉴定。例如晚唐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在文献中时有记载，但后人一直不知是何物，直至1987年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瓷秘色椀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盏子共六枚”，才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另外，地宫中还有一件未记入碑文的八棱净水秘色瓷瓶（图1）。这十四件秘色瓷均是一级文物，分别藏于法门寺博物馆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成为鉴定其他器物是否为秘色瓷及其确切年代的“标准器”。

“造型、纹饰、釉色等能反映时代风格和浓郁民族色彩的”，可以理解为从该瓷器的造型、纹饰以及釉色来看，能够强烈反映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具体来讲，造型极具时代特征；纹饰具有深厚的艺术价值；釉色或者彩绘有着独特的风格，能够成为当时瓷器制作的代表性品种。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唐僧取经图”瓷枕（图2），该枕似长方体造型，中部略凹，胎地褐彩，主题图案为唐僧取经的画面，底部刻有“古相张家造”的款识。《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成书于明代。这件瓷枕的纹饰说明了与《西游记》相关的故事至少在元代即已出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被定为一级文物。

“有文献记载的名瓷、历代官窑及民窑的代表作”，可以理解为该瓷器制作精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文献中有所记录；官窑瓷器是皇家需求的产物，其代表作更是不计成本，是皇权制度在物质文化上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与审美取向；民窑瓷器则是面向大众的产物，其代表作较普通产品更为精细，是研究当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材料。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釉色天青、色泽莹润，为北宋徽宗所推崇。有关汝瓷的文献记载贯穿于多个历史时期。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可见此时汝窑瓷器已罕见。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汝窑“薄甚亦难得”。民国时期，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记载汝窑“厚若堆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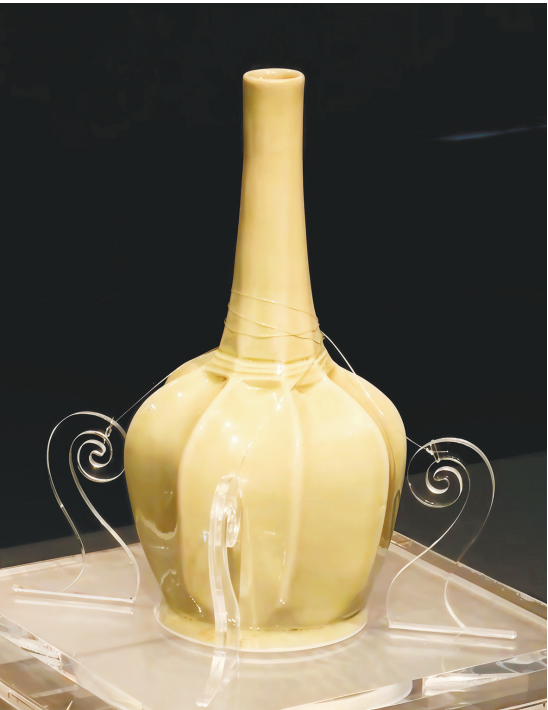


图1 唐代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法门寺博物馆藏

馆藏瓷器类文物定级标准及实例探讨

熊航
贺云翱



图2 元代“唐僧取经图”瓷枕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3 宋代青白釉瓷枕 余干县博物馆藏



图4 明代青花花卉纹盖罐 漳浦县博物馆藏

色纯净深穆”。据研究，目前汝窑的完整器传世不足百件，弥足珍贵，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樽与圆洗等，均为一级文物。

馆藏瓷器类二级文物定级标准及实例探讨

在《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馆藏二级文物被认为“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但并未对二、三级文物的定级标准举例，注明可参照一级文物定级标准的举例类推。就瓷器类二级文物而言，定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参考：

对断代具有参考价值。这一条与一级文物的定级标准一致，此类器物具有明确的年代，可作为“标尺”去评判其他未知的瓷器。原始瓷器诞生于夏代晚期，成熟的瓷器则出现在东汉。1957年，江西省南昌市郊出土一件东汉时期的四系罐，它釉色青黄，器身以麻布纹做饰，特征鲜明，可用来作为断代的“标准器”，被定为二级文物，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制作考究，有一定的存世量。此类瓷器一般品质较高，但并不属于罕见品。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景德镇窑瓷枕（图3），其釉色青白，器型规整，略呈长方体造型，为弧形枕面，印有钱纹，可见土沁色，被定为二级文物。类似器物在故宫博物院、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均有收藏。

器物少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出现了少量残损的情况。对于一些瓷器而言，其制作精美，如若完整可被评定为一级文物，由于少量残损，也只能被评为二级文物。釉里红瓷器创烧于元代，烧造难度大，成品率低，因此存世量少。1955年，在安徽省合肥市西郊出土一件元代釉里红盖罐，此罐形体硕大，发色鲜艳，主题图案为“凤穿牡丹”与“鸳鸯池塘”纹，并配以莲瓣纹、卷草纹、钱纹及云纹等，器身经过修复，被定为二级文物，现藏于安徽博物院。

馆藏瓷器类三级文物定级标准及实例探讨

在《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馆藏三级文物被认为“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就瓷器类三级文物而言，定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参考：

存世量大，保存状况较好。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青花花卉纹盖罐（图4）。其青花发色蓝中偏灰，釉层带有细碎开片，盖面绘折枝花，罐身绘缠枝花卉纹，纹饰率性洒脱，是漳州窑的典型器物。这件瓷器是民间常见的生活用具，品相完整，被定为三级文物。漳州市博物馆藏有同类产品。“南澳Ⅰ号”沉船曾出水两万余件漳州窑瓷器，其中也发现有类似盖罐。

明显残损，但品种可作为典型案例参考。1985年，在浙江义乌出土一件龙泉窑青釉盘，盘通体施青釉，为菊瓣盘口造型，内心刻折枝菊枝，胎质灰白。其器型与常见的菊瓣盘不同，种类少见，但因残缺不全，被定为三级文物，现藏于义乌市博物馆。

具有代表性的窑口生产的品质一般的瓷器。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皇室进贡的“官钧”，存世量极少，生产珍贵，而“民钧”在元代时期仍有烧造，大多生产日用品，品质一般。在蒙古杭锦旗综合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钧窑乳钉三足碗，其外壁以乳钉为饰，颇具特色，惟釉色稍显暗淡，整体制作相对粗糙，被定为三级文物。

结语

文物定级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基本制度，是实现藏品依法管理、分级保护的重要手段。在进行定级时，应科学区分珍贵文物与一般文物，及时更新文物信息，提高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定级率。文物定级，能让博物馆切实掌握藏品的最新信息，激活藏品的潜在价值，有助于其充分发挥收藏保护、研究考证、展览教育等功能，使之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碧色万里 丝路华章

陈架运



图1 战国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



图2 双狮戏珠纹金花银盒



图3 辽代绫锦缘刺绣皮囊



图4 辽代鑿刻海东青纹圆形金饰片



图5 契丹男侍石俑(左)、女侍石俑(右)

碧草连天:草原丝路的源流

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始于蒙古高原东南，穿越大兴安岭，沿阴山山脉西行，最终抵达黑海之滨的北方通道，见证了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创新与包容。

展厅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图1）格外夺目。金饰牌上匍匐的猛虎周围环绕8只鸟，镶嵌7颗宝石，彰显了草原文化特有的“野兽纹样”。

10世纪至12世纪，草原丝绸之路迎来黄金时代。辽朝积极开拓西域，设西北路招讨司，建镇州，保障丝路畅通。银质双狮戏珠纹金花银盒（图2），盖顶模压一对相互追逐的狮子，盖顶边缘及盒身均饰折枝花纹，如明月般闪耀着唐代工艺对辽代的深远影响。

游牧农耕:文明交融的印记

辽朝建立后，“以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的契丹族创设了南北面官制、五京制、四时捺钵制等独特制度，实现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有机融合。

辽帝不常居皇宫，而是带领皇室贵族在草原上迁徙——春水、夏凉、秋山、坐冬，此即四时捺钵制。展览中的绫锦缘刺绣皮囊（图3）和鑿刻海东青纹圆形金饰片（图4），生动再现了辽史中记载的春捺钵时辽代贵族纵鹰鹄捕捉雕雁的场景。

契丹男女侍石俑（图5），出土于韩匡嗣墓，女俑盘发，身着左衽长袍，腰系长带；男俑方脸大耳，髡发，腰挂刺鹑雉。他们是南北面官制的历史见证，无言诉说着韩氏家族的辉煌。

（下转8版）



展览海报

千山共色 万里同风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故塞同风”展观后

袁永明

“故塞同风——长城及长城地带的文化交融”展是今年6月开馆的内蒙古博物院新馆推出的五个专题展览之一。自开幕以来，每天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观众，成为这个夏天极具热度的一个场景。无论是一件件的文物，还是循环播放的影像，都有很强的磁场，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评，常常发出赞叹。不久前，笔者也有幸一观，深感该展确属上乘之作。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之一，是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系统性文化遗产，这一点已为人所熟知。但许多人脑海中的长城，往往是像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那样，以砖石筑就外部结构的长城。殊不知这类长城只是中国长城遗产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长城遗产，呈现出复杂的样貌。就长城资源构成的类型而言，可分墙体、敌楼、城堡、烽燧等。单就墙体来说，就有以土、石、砖、木筑成者以及山险墙等不同形式。至于年代，则自东周以迄明末，垂两千年之久。作为复杂系统的长城多姿多彩，着实令人惊叹与着迷。但以省级综合性博物馆而言，要在有限的时空之内办好长城专题展，还是极具挑战性的。“故塞同风”展，应该说确实办得很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内蒙古得天独厚的长城资源是办好展览的基础。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统计结果可知，中国历代长城全长21196.18公里，分布于15个省级行政区域的404个县级行政区域。其中，内蒙古长城分布在全12个盟市的

76个县级行政区域，几乎覆盖了长城遗产的所有类型，跨越了长城发挥其原初功能的全部岁月。单论墙体总长，即达7570公里，约占全国历代长城总长度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遗存都日益受到重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力度显著提升。先天的优势、保护的加强，为办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深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长城考古的丰硕成果是办好展览的根本保证。“故塞同风”展实际上是文博考古人着力于内蒙古长城考古研究的又一新的奉献。内蒙古的长城考古早在20世纪早期即已开展。20世纪30年代，包括黄文弼、贝格曼等先贤在内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就已对位于今阿拉善盟境内的汉代长城遗存进行了调查。20世纪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佟柱臣曾经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等地考察了早期长城。这些前辈也均开展了相关研究。此后对于相关遗存的调查、发掘与室内研究未有中辍。特别是在国家文物局于21世纪初布置实施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内蒙古文博考古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不仅完成了高质量的野外工作，而且在短短数年间推出了翔实完备的系列报告7部。这些报告既有以长城所在盟市为单元编写者，也有诸如明长城、阴山秦汉长城等专题报告。与此同时，研究不断深入。可谓发现喜人、新见迭出。正是在这样厚实的基础上，长城专题展的适时推出堪称应运而生、水到渠成。在这项工作中，策展人、时任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的张文平研究馆员以其

多年来投身于长城考古研究的深厚积累，又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带领团队很好地将学术成果融会在这一展览之中，使得展览呈现出生动而又大气、严谨而不滞涩的学术气息。

良好的形式设计是展览效果的又一促进因素。除声、光、电等多种技术运用之外，展览实施团队还从细节抓起，从文献记载与实际遗存的真实还原抓起，做出了努力。比如，序厅中以浅浮雕的农夫驱牛犁耕与羊儿欢叫万马奔腾同在长城下的场景，表现了长城作为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纽带的意涵。背景中则以斑斓色块兼工带写绘制了晋蒙交界处的长城与黄河相依相伴的情状，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整个展厅模拟长城曲折分布的形态，从褐色石板到灰色砖块再到绿色草原，又用沙盘和多媒体来结合文物、文献、图片等，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内蒙古长城的风貌价值等等，特别着眼于其历史意义的阐发。笔者还注意到，展览中引用若干古代文献的字体也很讲究——汉代文献用汉隶，北魏文献用魏碑，唐代文献则用唐楷，从而使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也进一步丰富了艺术享受。这个细节也充分说明展览实施的严谨细致。

另外，同名展览此前曾在内蒙古博物院旧址举办，也曾于土默特右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展出，均获赞赏。目前的新展可谓全新升级版，同样好评如潮。我们希望并相信，“故塞同风”展必将会以其鲜活的表达、丰富的内涵，为弘扬长城文化、北疆文化、红色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